

# 以女人為喻：重探張愛玲、胡蘭成 1940 年代戰時散文寫作之交涉\*

趙家琦\*\*

## 摘 要

就張愛玲（1920-1995）的戰時散文，迄今研究多聚焦在張與同輩女作家的連繫關係，或論指張的散文文體富含的女性特質，及其經胡蘭成（1906-1981）的寫作借鑒所形塑的散文系譜。然而，有別於將張的散文置於女性文學範疇，或探究張、胡在散文技藝上的文字美學特性，本文擬重探張與胡的戰時散文以女人為喻的寫作表現，論析張藉此寄託創作觀之餘，並對淪陷區處境提出的現實觀照，同時耙梳胡蘭成透過評張來喻擬其政治立場的寫作表現。

本文首先溯及張憑藉「鴛鴦派」來樹立其女作家形象的成名契機，後關注張〈談女人〉的女人文明論，追蹤該文啟發胡蘭成發揮為女神論述來評張，並暗喻其附逆主和的政治取向。後由張在〈自己的文章〉提出的婦人性為切入點，分析張在文藝論評裡以女人為喻的日常寫作觀，既體現她對淪陷區偏安處境的時代寓託，對照著胡將張的女性書寫嫁接至對大東亞話語的詮說。本文指出，張、胡戰時散文的交涉不僅止於修辭的相仿，而有其藉女人為意象來隱喻戰時淪陷區之現實語境與爭取文壇話語權的企圖。

**關鍵詞：**張愛玲、胡蘭成、戰時、散文、女人

---

\* 本文為本人 110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跨語際／境的東方敘事：張愛玲長篇自傳性小說的文學繹寫與文化譯寫」（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005-046）相關研究成果。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賜教，在此謹申謝忱。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Women as Signifier: Reconsidering Eileen Chang and Hu Lancheng's Wartime Proses

Chao, Chia-chi<sup>\*\*\*</sup>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Eileen Chang (1920-1995)'s wartime proses in connection with Hu Lancheng (1906-1981)'s writings, of which women were described as signifier to project the writers' perspective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1940s occupied Shanghai.

It firstly traces Chang's rise to fame as a bourgeois-background female writer. Nex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ang's "About Women" of which the image of women is acclaimed as ancestral mother who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 is further interpreted by Hu as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China-Japan "soft-collaboration" in the World War II. In addition,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notion of "womanhood" which Chang used to elaborate her forte of writing regarding manners of life, while Hu took advantage of Chang's female image and imitated her feminine literary style to embellish his advocacy of Greater East Asian discourse.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women as the core signifier in Chang and Hu's wartime proses,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heir writings were embedded in political messages especially related to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1940s occupied Shanghai.

**Keywords:** Eileen Chang, Hu Lancheng, wartime, prose, women

---

<sup>\*\*\*</sup>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以女人為喻：重探張愛玲、胡蘭成 1940 年代戰時散文寫作之交涉

趙家琦

## 一、前言

當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知名作家，張愛玲（1920-1995）的傳奇生平不僅為讀者津津樂道，圍繞其作品的研究成果，亦被稱之為「張學」，以表迄今圍繞張愛玲的豐厚學術論述。而追溯當代「張學」之源，屬夏志清（1921-2013）1960 年代出版論著《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為影響尤鉅之作。夏氏在該論著裡一反左翼文學史觀，而以援引英美新批評（New Criticism）論為方法，論指張氏在寫作上的意象經營、精鍊的語言、修辭藝術與對人性描寫的深度，使張氏作品堪為文本性（textuality）<sup>1</sup>的完美體現，其寫作才華並足以媲美英美現代女文豪。

綜觀來說，夏氏論述不僅推動了張愛玲作品的典範化（canonization），又其彰顯張在文藝成就上對魯迅（1881-1936）代表之新文學軌範的超越，突顯了張作的女性特質具有的文學與文化意義。此可見論者所謂，夏氏評張愛玲論點中的「女作家」一詞「有其隱喻性」，因該詞不僅強調了張的女作家身分，並暗示了張氏作品的女性特質代表著「與文學同義的直覺或感性」、「對『意義』的抗拒」與「理性」的反面。而此類觀點的後續迴響，體現在張氏作品多被「定義在一個理性所不能滲透，不易異釋的女性空間」、「純粹的美學客體」與「現實世界的『她者』」；且在當代理論的闡發下，張氏作品的女性特質更成為涵攝社會、性別與政治等多重象徵意義的「女性書寫—陰性主體—她者—邊緣—非理性—反父權—去霸權—

<sup>1</sup> 該詞指涉文學作品的語言表現與修辭經營（如意象與隱喻等）等形式美學。參 Peter Stockwell, *Texture: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 Press, 2012).

反轉／顛覆現代性」的觀念系統，反映了張愛玲作品從經典而躍升至「超經典」(hypercanon)的特殊性。<sup>2</sup>

除了闡論張愛玲作品的女性特質具有的「超經典」性，另有論者則將張氏作品回置到其成名的戰時滬上時期，論指其寫作實踐與女性思潮和女性創作現象的關連。此如論者將張氏戰時作品，放大勘查至同期滬上所涵蓋散文、詩與小說的跨文類版圖，指出張的創作與彼時女作家在五四以降「新女性」思潮的脈絡上，並因應都會資本主義現代性，發展出著墨世俗情愛與經濟現實的通俗與務實性。<sup>3</sup>此外，針對張的戰時散文，亦可見論者分析這些作品具有的「城市性、現代性與女性特質」，指出張愛玲參與進戰時上海女性公共知識份子於出版產業的「性別政治」，<sup>4</sup>並闡述張與同期女作家同以善寫「女性的性別與社會角色的關係」、「家庭結構問題，以及對於婚姻合理性的再思考」的女性寫作特點；<sup>5</sup>或是論析張愛玲的戰時散文在主題內容與文體美學上富含的女性特質。<sup>6</sup>

在這一聚焦張愛玲戰時散文反映的女性寫作文化之外，亦有論者留意到張與

<sup>2</sup> 陳麗芬：〈超經典·女性·張愛玲〉，《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從台灣到香港》（臺北：書林，2000年），頁160-161、163、167。張英進：〈從反文典到後文典時期的超文典：作為文本和神話的張愛玲〉，《理論、歷史、都市：中西比較文學的跨學科視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26-145。

<sup>3</sup> 楊佳嫻：〈女性主導的刊物（二）：《天地》〉、〈（不）出走：張愛玲、蘇青及其作品〉，《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頁292-314、315-360。

<sup>4</sup> 黃心村著、胡靜譯：〈她的名字寫在水上：張愛玲與現代散文〉，《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頁190、153。

<sup>5</sup> 黃心村著、胡靜譯：〈她的名字寫在水上：張愛玲與現代散文〉，《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頁158。葉凱蒂：〈在淪陷上海寫作——蘇青以及她所創辦的文學雜誌《天地》〉，收於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下）》（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年），頁649-676。裴海燕（Jana Benešová）：〈“平實而熱鬧”之外——蘇青的寫實主義〉，《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6（2008年12月），頁135-165。

<sup>6</sup> 參論者就張氏散文在文體美學與風格的論析，指張的自傳性散文為「女性群體之歌」，且張作流露的諷刺、幽默、機警、怪誕和語言煉金之美，反映了張「獨特的女性書寫」有別「男性文體力求一元、統合」，而是以「分寫、散寫、雜寫、改寫」體現了「女性文體力求多元、散漫」的特質。周芬伶：〈在豔異的空氣中——散文〉，《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臺北：元尊文化，1999年），頁163、171。鍾正道：〈試析張愛玲散文中的女性意義〉，《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5期（1998年5月），頁97-111。張氏散文成就的概論與研究回顧，參劉紹銘：〈張愛玲的散文〉，《愛玲說》（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年），頁44-68。郝穎：〈新世紀張愛玲散文研究綜述〉，《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總第174期（2013年第2期），頁32-35。

同期男性文人的寫作交集，後者又以胡蘭成（1906-1981）為代表。在這類研究中，主要探討的為胡蘭成受到張的文學影響。如論者便注意到胡的戰後散文具有借鑒自張氏修辭藝術的特徵，指張「直觀感悟的看世界方式，啟發了胡蘭成在政論之外文字表達的抒情可能」，並集中於耙梳胡在形塑張愛玲散文系譜的關鍵地位。<sup>7</sup>更有論者直接將胡蘭成冠以張派作家，論指胡在其《今生今世》裡將與張的情緣「神話化」為一場「曠古受記」，指認胡從張處習得「直觀的詩性——神話邏輯」的寫作美學，甚而延續至胡氏後半生寫作志業所圍繞於「對女人的自覺的債務」<sup>8</sup>和對「情之誠／正／變」的自我辯證。<sup>9</sup>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關注胡蘭成單方面受到張愛玲的影響，另有論者從歷史脈絡化的角度，觀察到張、胡在 1940 年代滬上文壇場域的互動線索。如有論者發掘到胡於戰時辦的《苦竹》一刊，便刊載了張愛玲的散文與小說數篇，顯示了兩人在寫作上互為支援與合作的關係。<sup>10</sup>另有論者注意到張的戰時作品與攝像裡有關日本的人、事、物元素，提出張與淪陷時期大東亞主義下「於上海活躍進行文化轉譯的一派」的來往，<sup>11</sup>其中關鍵人物就包括了胡蘭成；另有論者從張、胡在寫作題材上互為引用的交叉線索，推論胡蘭成因其特殊政治背景而提供予張愛玲寫作資源的媒介者角色。<sup>12</sup>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見，張、胡在文學實踐上的交集，顯示了張愛玲的戰時散

<sup>7</sup> 張瑞芬：〈張愛玲的散文系譜〉，《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8 期（2004 年 5 月），頁 92；張瑞芬：〈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臺灣當代文學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07 年），頁 39-42。

<sup>8</sup> 黃錦樹：〈世俗的救贖：論張派作家胡蘭成的超越之路〉，《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臺北：麥田，2006 年），頁 135-137。

<sup>9</sup> 王德威：〈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171-215。

<sup>10</sup> 李娟：〈《苦竹》雜誌時期的張愛玲與胡蘭成〉，《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2007 年 2 月），頁 53-60。楊世運：〈胡蘭成和張愛玲的“苦竹”〉，《粵海風》，2011 年第 2 期，頁 34-36。林夏：〈張愛玲和《苦竹》〉，《河南教育（中旬刊）》總第 90 期（2012 年第 10 期），頁 60-61。

<sup>11</sup> 黃心村：〈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收於林幸謙主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新北市：聯經，2018 年），頁 285。

<sup>12</sup> 池上貞子：〈張愛玲與日本——談談她的散文中的幾個事實〉，收於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麥田，1999 年），頁 86。池上貞子：〈傳記與虛構：張愛玲與陳舜臣及其他日本作家的對照〉，收於林幸謙主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頁 262。蔡登山：〈〈色，戒〉的背後〉，《傳奇未完：張愛玲》（臺北：天下遠見，2003 年），頁 227-228、244。

文並非僅隸屬女作家群體的特定範疇，且張、胡的來往關係亦不僅止於私人領域，而足以延伸出雙方在公共領域的文學交涉活動。因此，鑒於張的戰時散文所體現其「因應情勢及與同輩作家所作的對話姿態與自我定位」<sup>13</sup>仍存在可追蹤的空間，本文擬重探張、胡戰時散文以女人為喻的寫作表現，旨在探論雙方在其散文書裡帶入的女性意象與詮說，既有為彼此樹立創作定位的對話性，亦展現兩人對戰時淪陷區之特殊時空處境提出的現實隱喻。循此，本文將首先溯及張憑藉「鴛鴦派」來形塑其女作家形象的成名契機，後關注張的〈談女人〉，追蹤該文啟發胡蘭成以女神論述來評張，並暗喻自身附逆主和的政治立場。其後，以張在〈自己的文章〉提出的婦人性為切入點，分析張在文藝論評裡以女人為喻象的日常寫作觀，進以闡析胡將張的女性書寫，嫁接至對大東亞主義的文藝化詮說。概言之，本文以舉論張、胡戰時散文以女人為喻的寫作表現，探析兩人的寫作交涉並非僅止於文字技藝的交會，而有其藉此爭取文壇話語權，並對滬上淪陷區提出時代見解與政治觀的潛話語脈絡。

## 二、創生與求和：

### 張愛玲的女性修辭到胡蘭成的女神論

張愛玲於戰時上海的成名契機，與「鴛鴦蝴蝶派」（以下簡稱「鴛鴦派」）有著密切關聯。1943年，甫因香港戰事留學歸來的張，透過了母系遠親黃岳淵（1880-1964）為中間人，將自己引介予「鴛鴦派」大家周瘦鵑（1895-1968），並經周的推薦，張的〈沉香屑〉刊登在周主編的文學刊物《紫羅蘭》，自此成名。<sup>14</sup>事實上，張愛玲以《紫羅蘭》為出場平臺，顯示了她有意借重「鴛鴦派」的象徵資本作為登上滬上文壇的有利資源。一方面，以《紫羅蘭》為發表載體，既彰顯張愛玲以系出名門之姿，將其文藝系譜連結至舊派海上名流群體的家族威望與文化資本；

<sup>13</sup> 陳麗芬：〈超經典·女性·張愛玲〉，頁167。

<sup>14</sup> 張愛玲：〈沉香屑：第一爐香〉與〈沉香屑：第二爐香〉，載《紫羅蘭》復刊號第2-6期（1943年5-9月）。《紫羅蘭》創辦於1925年12月，至1930年6月第96期停刊，1943年4月復刊，1945年3月終刊。本文就討論文獻之原載出處，僅標示刊物名、期數與年月份，刊登頁數或因未能核對原始文獻、原刊未標示或年久破損造成辨識不易等原因，將不予標示。

<sup>15</sup>另一方面，「鴛鴦派」作為近世上海文壇跨足古典文體、言情譯／繹寫與跨界影像敘事等通俗文藝實踐，<sup>16</sup>並可說將張愛玲〈沉香屑〉以兩性情戀與女性情感為主題的創作，得以在「鴛鴦派」這一文學符碼所召喚讀者就通俗言情文藝與情感文化的想像結構上，順利推動張愛玲進入滬上公眾讀者的閱讀視野。

承上來論，張愛玲透過「鴛鴦派」承載的象徵資本登上文壇，反映了其創作屬性與「鴛鴦派」之陰性化風格的相類性。此可見張的〈沉香屑〉小說題名便以「沉香」與「爐香」此具古典詩詞意象的詞藻符碼，回應著「鴛鴦派」之言情文藝的審美特性。此外，《紫羅蘭》封圖與內頁的美術設計以花卉圖樣來烘托該刊作為城市閨閣言情話語場，亦使張的〈沉香屑〉透過該刊風格的女性化指涉與唯美的圖、文藝術，彰顯其筆下的「傳奇」對於「鴛鴦派」文藝的承續並發揮。此外，周瘦鵑並於〈沉香屑〉刊出時特地撰寫推薦序，<sup>17</sup>文中既將他與張的會面過程以引入張氏姑母就「鴛鴦派」的閱讀經驗，再加上其親臨張氏西化寓所的唯美體驗與抒情描寫，進而加強塑造了張氏與其創作為承續「鴛鴦派」之女性（化）通俗言情系譜的後起新秀／作。

值得注意的是，張的登上文壇，雖憑藉周氏等舊派男性名流主導的「鴛鴦派」為資源，但其〈沉香屑〉結合西化修辭來鋪寫反高潮的異域敘事，則顯示張以新一代女性受教者的創作視野，從而將「鴛鴦派」的閨閣言情趣味，轉化為更符合中產市民讀者之知識結構與生活語境的社會寫情實踐。<sup>18</sup>而這種突顯個人創作所分化自、並超越於「鴛鴦派」的寫作自覺意識，其後更展現在張於〈沉香屑〉發表告捷後，緊接寫了一篇宣告式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sup>19</sup>。文中，張既以「通」形容上海城民因應租界殖民背景所發展出「非」常人的處世智慧，就中更以我「為」

<sup>15</sup> 黃岳淵，名渭，別名剡曲灌叟。參王道：〈《花經》、黃家花園與周瘦鵑父子〉，《書城》2020年第7期，頁93-97。

<sup>16</sup> 陳建華：〈周瘦鵑與紫羅蘭：文化商品的建構及其文化意涵〉、〈演講實錄 I——民國初期消閒雜誌與女性話語的轉型〉，《中正漢學研究》總第22期（2013年12月），頁239-270；355-386。

<sup>17</sup> 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頭〉，《紫羅蘭》復刊號第2期（1943年5月），收於陳子善編：《張愛玲的風氣：1949年前的張愛玲評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63-65。

<sup>18</sup> 楊照：〈透過張愛玲看人間——七〇、八〇年代之交台灣小說的浪漫轉向〉，《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臺北：麥田，2010年），頁231-32。

<sup>19</sup> 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載《雜誌》第11卷第5期（1943年8月），收於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臺北：皇冠，2001年），頁8-9。

我「喜歡」與我「希望」上海人等語，強調其與滬上讀者共享現代都會中產階級「習氣」(“habitus”)<sup>20</sup>的同質性，由此彰顯其創作所企圖、並已然足以構築出一體現「上海」人之文化身分認同的文學特惠 (privileged) 社群與創作—閱讀消費生產鏈。

〈到底是上海人〉所表現張愛玲企圖將目標讀者，由以往隸屬民初言情範疇的「鴛鴦派」讀者，擴展到更具現代知識品味的新興中產市民讀者，亦反映在張愛玲於〈沉香屑〉發表後，其不再將作品投至《紫羅蘭》，而是就戰時滬上文藝媒體的所屬定位來重擬發表策略，其並著眼小說與散文在文類體裁、審美趨向與文體特性等區別，展開其後續作品的發表規劃。如張此後便將小說作品主要發表在綜合性文藝刊物《雜誌》，既以此刊為基地來構築其文藝才華在公眾領域的能見度，也憑賴該刊在戰時上海之政治定位的模糊性，為其都會「傳奇」尋找到一互為屏障與資源互惠的傳播場域。<sup>21</sup>同時，張則將散文作品主要發表在蘇青(1914-1982)主編的《天地》，反映其將散文這一較屬於私密性的文類，用以抒發個人生活體驗、日常感興和街頭見聞等，既從中與讀者展開較親近的交流，亦通過與女編輯的搭配合作，既被動、又主動地將其散文寫作，打造為橫跨公、私領域的自我宣傳與滿足讀者窺欲的讀物，由此參與進戰時上海女作家的都會文藝話語場。<sup>22</sup>

事實上，與女編輯者展開合作的同時，張愛玲具有女性觀點的散文寫作，亦可見其在1943年底於《古今》一刊發表的〈洋人看京戲與其他〉與〈更衣記〉。<sup>23</sup>相較於《天地》以女性編一著者構築出鮮明的女性寫作話語場，《古今》則是以

<sup>20</sup> “Habitus”，概義指個人生存樣態與社會階級、環境動態之依存互涉的實踐過程。參高宣揚：《布爾迪厄》(臺北：生智，2002年)，頁190-226。

<sup>21</sup> 李相銀：〈論《雜誌》對張愛玲“經典化”的意義〉，《廣西社會科學》總第161期(2008年第11期)，頁136-140。《雜誌》隸屬《新中國報》，後台為日本駐滬領事館，創於1942年8月，終刊於1945年8月。論者指，《雜誌》社長袁殊、經理翁永清與主筆魯風等均為中共地下黨員。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65-66；李相銀：《上海淪陷時期文學期刊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頁159。

<sup>22</sup> 《天地》，創於1943年10月，終刊於1945年6月。《天地》研究，見黃心村著、胡靜譯：〈打造公共知識分子：女性出版文化的誕生〉，《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頁60-99。

<sup>23</sup> 《古今》創刊於1942年3月，終刊於1944年10月。〈洋人看京戲與其他〉，英文版題以“Still Alive”，載 *The Twentieth Century* 4.6 (1943), pp. 432-38，中譯版載《古今》第34期(1943年11月)；〈更衣記〉，英文版題以“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載 *The Twentieth Century* 4.1(1943), pp. 54-61，中譯版載《古今》第36期(1943年12月)。

任職汪偽政府之男性菁英文人為主要作者群的文藝刊物。作為一特定社群刊物，《古今》所載作品多為淪陷區政治文人以著墨擬古憶舊、考證隨筆與日常抒情的散文寫作，反映其以遠離現實政治的「古今」隨筆與清淡雅言，從中寄託自身擺盪在附逆之恥／救國之志、出世／入世與政治贖罪／人文抱負的曖昧心境。<sup>24</sup>然而，相較《古今》男作家們善以借古託志與務求清簡雅正的寫作文風，來闡揚其對維護中國「舊道統」與確立日常中國文化身分的表述模式，<sup>25</sup>張的〈洋人看京戲與其他〉則以納入東、西文化觀照視野，並以活潑肆意的筆調，聚焦京劇這一傳統戲種來闡揚中國民間文化與民族感性心態，其〈更衣記〉更以闡述近百年中國女性服裝的歷史演變與美學鑑賞，進以折射張以融入女性話題的趣味向度，為男性政客文人為主要創作群體的《古今》與其文藝生態，注入進別具女性觀照視野的文化論說。

以聚焦於女性話題來進行文化闡述，1944 年春，張愛玲更發表一篇直接以女性為申說對象的散文〈談女人〉<sup>26</sup>，展現其在西化中產階級的知識背景上，既對都會性別文化進行詼諧申說，並展現其以女人為喻的文明創始觀。如文章起始，張愛玲首先引述了西方中產詼諧智趣的英文雋語小品《貓》為開場，藉此調侃都會現實情境裡，現代女性在顛倒與錯置兩性權力關係的弔詭。其後，張則由對現代兩性關係的幽默詮說，延展出以女性為人類文明創生者的史觀想像。如張表示，現代社會進化到高度文明的階段，為表現在「超人」以富含男性陽剛的形象，象徵著文明的「進取」與對「生存」的突破。然而在張看來，現代社會崇拜的「超人」卻代表了非人性的「訓練與壓抑」與「男子偏於某一方面的發展」；而她欣賞的則是與「超人」相對的女人所代表的普世四季循環與基本的生命繁衍之道。換言之，在張的詮釋下，如果說「超人是男性的」，「神」卻以「帶有女性的成分」，如大地之母撫育眾生而具有「廣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

延續著女性具有神性／母性的論見，張愛玲在〈談女人〉不僅直指女性「精神裡」所存在「『地母』的根芽」，其在文中後段更援引進西方文藝裡的裸女／妓

<sup>24</sup> 傅葆石著、張霖譯：〈合作：“《古今》派”的遺民文學〉，《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頁141-204。

<sup>25</sup> 高嘉謙：〈風雅·詩教·政治抒情：論汪政權、龍榆生與《同聲月刊》〉，《中山人文學報》第38期（2015年1月），頁66-67。

<sup>26</sup> 張愛玲：〈談女人〉，載《天地》第6期（1944年3月），收於《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頁101-111。

女／地母意象，<sup>27</sup>以聚焦女性富含肉感與生殖性的性別生理本質，再以結合如宇宙自然論與物種生命史等，一發其由女性創生的遠古情境，並對未來「女人統治世界」之既往開來、極具宏觀想像的女人文明論：

幾千年來女人始終處於教化之外，焉知她們不在那裡培養元氣，圖謀大舉？……「地母」是一個妓女。「一個強壯、安靜、肉感、黃頭髮的女人，……深沉的天性的騷動，……像一條神聖的牛，忘卻了時間，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sup>28</sup>

整體以觀，張愛玲在〈談女人〉後半部以引入西方文藝裡的地母意象，從中闡揚女體代表的性、生殖與繁衍的原始性與神聖性，再將其投射為宏大的女人文明論，不僅展現對父系宗室論的挑釁，<sup>29</sup>也顯示了她對女性提出極富想像力的性別詮說。然而，在看似充滿詼諧趣味與不羈大膽的史觀詮想下，張在〈談女人〉裡特別著墨女人為申說對象的散論，亦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其對戰時滬上時代處境的現實觀照。如一方面，張在文中援引西方睿智巧慧的性別詼諧小品，表現了其以中西合併的文藝取材視野與詮釋觀點，彰顯其別具現代中產知識品味的都會世俗言談。另一方面，張引入西方文藝裡具史詩氣息的地母意象，並突顯了其以身處動盪時代對人類命運在歷史興衰下的深刻感觸；又其強調、並讚揚女性具有孕育生命而承載萬物的包容性，亦可見到張藉此喻比淪陷區之偏安<sup>30</sup>語境在戰爭亂世下的難得可貴。

承上來論，張愛玲在〈談女人〉裡提出女人創世的文明觀，不僅突顯了其對

<sup>27</sup> 張引用材料包括英國小說家阿道司·赫胥黎 (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 寫兩性關係的《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 1928)，以及美國表現主義作家尤金·歐尼爾 (Eugene O'Neill, 1888-1953)《大神勃朗》(The Great God Brown, 1926) 劇作中地母一角體現的創世神母形象。

<sup>28</sup> 張愛玲：〈談女人〉，頁 108-109。

<sup>29</sup> 鍾正道：〈試析張愛玲散文中的女性意義〉，頁 104-107。

<sup>30</sup> 「偏安」，指國家分裂而擁有部份國體的政權體制，本文用指汪精衛 1938 年底在《南華日報》發表〈豔電〉以響應日、中「和平」運動，以及汪與日本簽訂和平協議後，於 1940 年春還都南京到 1945 年的「偏安」政權（即中方史觀裡稱日方統轄下的傀儡政權「淪陷區」）。汪偽政體與戰時日本官方的合作關係，參 John Hunter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9: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72)。

自身所屬的女性身分，賦予上人類文化史觀的意義向度，又張以大地神母的意象來暗指淪陷區偏安語境難得可貴的基本日常，進而啟發了胡蘭成藉由評張，從而發揮他對自身附逆主和立場的性別化詮說。1944 年年中，在文壇前輩傅雷（1908-1966）評論張氏作品之文刊出時，<sup>31</sup>胡蘭成亦發表了評說張愛玲的散論〈評張愛玲〉。<sup>32</sup>事實上，胡蘭成撰寫〈評張愛玲〉的遠因，可溯及 1943 年底胡與汪精衛（1883-1944）發生政治歧見被捕，張間接得知胡下獄之事；隔年 2 月，胡被釋返滬，兩人結識並展開交往。<sup>33</sup>或許正因為發表〈評張愛玲〉時已與張產生情感關係，胡蘭成的〈評張愛玲〉相較傅雷在〈論張愛玲的小說〉裡對張作的嚴謹論評，不僅在行文筆鋒上以擬仿張氏散文富含精妙詩意的「流言」<sup>34</sup>體式，其通篇內容並可說將張〈談女人〉裡的女人文明論，進一步衍繹為具有「陰性烏托邦」<sup>35</sup>色彩的女神論。如文章起始，胡蘭成便援引感官顏色與自然意象來闡揚張氏的「青春」之美，<sup>36</sup>後再引入東方宗教語彙「慈悲」與希臘文明、基督創世等文辭，強調張氏作品之具現化眾生「素樸」世相，並讚許張以其女性悲憫情懷對「弱者的愛」和對生命的「虔誠」、「莊嚴」，甚而將張奉為帶來生之希望的「黎明的女神」。<sup>37</sup>

概觀來看，胡蘭成在〈評張愛玲〉著力闡述張氏其人其作的女性特質，並強調這份女性特性所帶予他超驗性的精神感召與直覺美感，<sup>38</sup>不僅顯示了胡從與張氏情戀獲得的文學啟悟；並且，胡在文中亦有意無意地將張的女性書寫，寄託進政治寓意的向度。如有別於傅雷批判張的〈傾城之戀〉為著墨在俗世男女虛飾矯作的愛情遊戲，胡則將小說裡所述兩性情愛的「自私」，視為對照左翼集體革命話

<sup>31</sup> 迅雨：〈論張愛玲的小說〉，載《萬象》第 11 期（1944 年 5 月），收於陳子善編：《張愛玲的風氣：1949 年前的張愛玲評說》，頁 3-18。

<sup>32</sup> 胡蘭成：〈評張愛玲〉，載《雜誌》第 13 卷第 2、3 期（1944 年 5、6 月），收於胡蘭成：〈論張愛玲〉，《亂世文談》（臺北：印刻文學，2009 年），頁 10-28。

<sup>33</sup> 胡蘭成 1939 年以政論〈戰難，和亦不易〉獲汪賞識；1940 年春受任為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後因派系鬥爭與 1943 年以言論抵觸汪，年底被革職下獄；1944 年初胡被釋，與汪系政權日漸疏遠、轉往親日。張桂華：〈嶄露頭角崢嶸〉、〈宦海浮沉〉、〈背汪投日〉，《胡蘭成傳》（臺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11 年），頁 93-112、113-132、183-198。秦賢次，〈謊言與真相——胡蘭成生平考釋〉，《新文學史料》2011 年第 1 期，頁 28-41。

<sup>34</sup> 黃心村著、胡靜譯：〈第四章 她的名字寫在水上：張愛玲與現代散文〉，頁 150-153。

<sup>35</sup> 黃錦樹：〈世俗的救贖：論張派作家胡蘭成的超越之路〉，頁 135。

<sup>36</sup> 劉鋒杰：〈青春的張愛玲——由胡蘭成的《評張愛玲》談起之——〉，《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總第 72 期（2004 年第 4 期），頁 12-18。

<sup>37</sup> 胡蘭成：〈論張愛玲〉，頁 11、13-16。

<sup>38</sup> 黃錦樹：〈世俗的救贖：論張派作家胡蘭成的超越之路〉，頁 131-141。

語而極具範示的「個人主義」哲學。且在胡的闡述下，張愛玲具有「個人主義」意味的寫作內容，更可說緊密扣連著張的女性身分而具正面意義。即在胡看來，張的「自私」並非負面缺點，卻是以關注小我的個人取向，代表著女性善求退守與不爭尚和的特質，而此特質足以讓人反思左翼革命陣營與抗日主戰派訴諸陽剛尚武所帶來的暴力、毀壞與戰爭等負面後果。

此外，為彰顯張愛玲的女性特質具有的象徵意義，胡在文中更引入張的個人攝像照，藉由著視覺圖像，進以闡述張的女性特質具有以和為美、以柔勝剛的政治隱喻性。如在胡蘭成的闡述下，張愛玲有如為世人帶來生之曙光的「女神」形象，更被融入進「女奴」意象，進而勾連起與主和派的關聯。具體來看，胡在文中便謂張在《雜誌》刊登小照有如一「逃走的女奴」（見圖一）<sup>39</sup>，而此女奴形象不僅與魯迅那充滿「超人式的憤怒」的「淒厲」形象呈顯明對比；且在胡看來，張的「女奴」姿態雖看似馴從，但並非指張為供人驅使而無尊嚴的奴隸，而是張愛玲在照片中看似「奴」、卻實為充滿生命奔放的「逃走」形象，體現了張為具有自覺意識的「舊時代的抗議者」。換言之，在胡的詮釋下，張愛玲於攝像照裡體現的「奴」性，並非是指供人差遣的低等奴隸，而是其如「奴」般的順服姿態，更能突顯其身為女性的和美陰柔特質，且其「欲逃走」的個人反叛之姿，亦以迥異西方男性先哲如「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或「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而是張深富女性氣質的「柔和、明淨」，使其「奴」性為體現了女性作為創生者之「神」性的一體兩面，讓胡盛讚張如救世女神降臨人間而「把人類的感情擦拭乾淨」，並以其「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sup>40</sup>

概觀之，胡蘭成的〈評張愛玲〉通篇洋洋灑灑，並非採取嚴謹的論評體例，但該文重點本不在其邏輯的合理性與否，而在於胡試圖將張愛玲在〈談女人〉的女人文明論，轉化發揮為他的女神論，既從中突顯他對張氏文學成就的謳歌，更以借此喻彼的方式，表達其反對共黨革命觀與主戰派觀點，進而迂迴地力陳其選擇親日合作、主和為貴的政治立場。具體來說，藉由將張比喻為創生的女神與叛逃的女奴，胡暗示了戰時淪陷區以軟性合作（soft collaboration）<sup>41</sup>的親日主和路

<sup>39</sup> 〈女作家〉，《雜誌》第13卷第2期（1944年5月），轉引自吳邦謀：〈愛，沒有早一步〉，《尋覓張愛玲》（香港：商務印書館，2020年），頁143。

<sup>40</sup> 胡蘭成：〈論張愛玲〉，頁23-25、28。

<sup>41</sup> 傅葆石著、張霖譯：〈合作：“《古今》派”的遺民文學〉，頁179。

線並非是如「奴」般的軟弱與喪恥，卻是「奴」的不爭與具個人性的叛逃，正如主和派講求小我犧牲與委曲求全來安穩現世之「偉大」；且主和派主張的「和平」運動，也如同救世女神之下凡人間、化解爭奪所帶來的愛與慈悲。由此而言，胡的〈評張愛玲〉固然表現了胡以仿張筆觸來彰顯張的女性寫作特質，但張愛玲的女性身分，毋寧說成為了胡譬擬其所屬附逆主和路線（與其陰柔特性）<sup>42</sup>的女性喻像，映顯出胡於文中鑲嵌進的政治暗喻向度。

### 三、化日常凡趣為東方諧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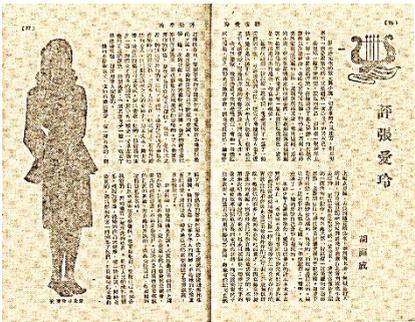
#### 張愛玲的談文論藝與胡蘭成的文明復興說

承上節所論，胡蘭成在〈評張愛玲〉以女神論對張愛玲充滿感性的詩意讚頌，透露了彼時張、胡情戀的語言交會；然意在言外的是，胡對張的女人論延伸出的政治化比附，亦表露了胡透過擬張的語言技藝而穿梭於政壇與文壇的叛／愛國詭辯修辭，<sup>43</sup>並透露了胡藉此自我寬慰地美化其欲蓋彌彰的附逆身分。而對張愛玲來說，胡蘭成將其女人文明論發揮為一讚頌女神救世的宏大論調，亦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文學定位，樹立起一以女性為意象的闡述框架。如當胡〈評張愛玲〉刊登時，其附圖為張愛玲的全身剪影素描（見圖二）<sup>44</sup>，而該圖所突出張氏女性柔美之丰儀，配以文章標題上方繪以古希臘神話傳說中作為抒情詩人樂器的里拉琴（lyre）圖像，更形象化地呼應了胡文以女神論對張愛玲女性之美的讚頌。

<sup>42</sup> 如胡在〈張愛玲與左派〉一文裡亦提出這種揚「柔」（陰柔、和談）反「力」（陽剛、武鬥）的觀點：「他們……沒有柔和，崇拜硬性。他們還崇拜力，是崇拜物理的力，不是生命力……。」胡蘭成：〈張愛玲與左派〉，載《天地》第 21 期（1945 年 6 月），見《亂世文談》，頁 30。有關汪偽政權組建成員多為言官與策士，又其主張主和親善而與左翼陣營和主戰派的立場對照，參傅葆石著、張霖譯：〈合作：“《古今》派”的遺民文學〉，頁 150。

<sup>43</sup> 王德威：〈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頁 179-180。

<sup>44</sup> 胡蘭成：〈評張愛玲〉，《雜誌》第 13 卷第 2 期（1944 年 5 月），轉引自吳邦謀：〈低到塵埃裏〉，《尋覓張愛玲》，頁 159。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圖一</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女作家：張愛玲女士〉， 《雜誌》第 13 卷第 2 期 (1944 年 5 月)</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圖二</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胡蘭成，〈評張愛玲〉， 《雜誌》第 13 卷第 2 期 (1944 年 5 月)</p>

與此同時，張亦為文〈自己的文章〉<sup>45</sup>，就中延續了其〈談女人〉的女人文明論，進以申說其著墨生命日常與平常凡趣來闡揚「婦人性」的創作觀。如該文起始，張愛玲便將創作題材區分以「超人／人生飛揚與鬥爭／力」與「凡人／人生安穩與和諧／美」的對照模式，既批評前者訴求「鬥爭」而「失去了人生的和諧」、「缺少人性」，並指陳自己傾好的無非為後者那「安穩」、「和諧」所體現生命根本的「人的神性」與「婦人性」。沿此對日常人情的重視，張並提出自身創作的兩個關鍵概念，即以「蒼涼」以表其著墨瑣屑情愛與人性之微具有的人生啟示與「深長的回味」，並申說其以「參差對照」來再現人生世相與人性本質的「不徹底」。而從張的所述可見，無論是「蒼涼」所相對於悲壯之力而指涉具陰性氣質的低迴之「美」，<sup>46</sup>或是「參差對照」突出人類從古老記憶尋求生命萬象之虛／實掩映的「永恆性」，皆體現〈自己的文章〉既是張在〈談女人〉裡女人文明論的延續，亦與胡在〈評張愛玲〉裡著墨女性之柔和來讚揚生命日常之安穩諧美的論點，互為唱和。

然而，有別於胡蘭成在〈評張愛玲〉以恢弘的女神論來闡揚張的女性身分具

<sup>45</sup> 張愛玲：〈自己的文章〉，載《新東方》第 4、5 期合刊（1944 年 5 月），收於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頁 88-94。

<sup>46</sup> 姚玳玫：〈與迅雨對話：張愛玲的女性修辭〉，《新文學史料》2004 年第 3 期，頁 155。

有的政治喻比性，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裡提出的婦人性一詞，則是強調婦人（即女人）代表的日常軌則與人情本質。並且，張愛玲此以婦人性來彰顯其關注於家常世俗的創作觀，並可見其在〈忘不了的畫〉<sup>47</sup>裡以對東、西方繪畫的畫藝論評，就中闡述畫作裡眾「女」相所再現凡民情感的生命共相。如就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 1848-1903）的〈永遠不再〉一作，張便以其瑰麗精妙之筆來描述畫中裸女土著富含的女性肉感，將其「橫潑」風情比類於「上海的小家婦女」，並申說畫作中女郎流露的「原始的悲愴」為體現飽經情愛風塵後的「心平氣和」。而美國現代畫裡眺望窗外摩天大樓的室內裸身妓女背影，在張看來並無腥羶色暗示，卻是體現了性的刺激終將讓渡給日復一日「平板的貧乏」與「時間的重壓」。至於林風眠（1900-1991）所繪中國小城裡的黑衣雛妓，則讓張愛玲聯想到「鴛鴦派」無傷大雅的小趣味與人情「溫暖」。同樣地，張愛玲亦認為日本古典畫作〈青樓十二時〉裡的藝妓無關情色，而是其「輕飄」舉止為流露著「被愛著」的繾綣心思。又在張愛玲看來，相較歐洲聖母畫像將瑪麗亞描繪為脫俗不凡的「尊貴」聖女，東洋畫〈山姥與金太郎〉則是以誇張肆意並體貼庶情的民俗畫風，生動地再現了山姥「涵容籠罩」的母性，及其與金太郎之間那飽含「母子」、又是「男女的基本關係」而展現「近人情」、「正大」與「開天闢地之初」的文明創始情調，使張高度讚揚該畫作洋溢的體貼入世情懷。<sup>48</sup>

除了在〈忘不了的畫〉以談畫論藝，突出「婦人性」指涉的生命普常與人情共感，張愛玲在其部份隨筆，亦以諧擬周作人為代表的淪陷區小品風潮，<sup>49</sup>盡顯其以亦莊亦諧的絮語筆觸來著墨日常瑣趣的「婦人」之言。如〈詩與胡說〉<sup>50</sup>便是張此類代表作。文章開首，張便打趣地自表其寫作因由為來自夏病困乏而賦閒在家，使她得以從閱覽文藝群書的「風雅」當中，「索性高尚一下」來談詩。順此，張援引了周作人譯的「苦竹」和歌詩為開場，再以仿擬周氏的「輕性知識份子」作風來對滬上詩家路易士（即紀弦，1913-2013）展開閒談「胡說」。整體以觀，張在該

<sup>47</sup> 張愛玲：〈忘不了的畫〉，載《雜誌》第 13 卷第 6 期（1944 年 9 月），收於《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頁 186-193。

<sup>48</sup> 池上貞子：〈張愛玲和日本——談談她的散文中的幾個事實〉，頁 95。

<sup>49</sup> 黃開發主編：〈周作人的小品文〉，《中國散文通史·現代卷（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177-197。

<sup>50</sup> 張愛玲：〈詩與胡說〉，載《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1944 年 8 月），收於《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頁 163-168。

文裡沒有正經八百的論詩，卻是採取自由隨興的點染評說，以評賞路氏「用字吝惜」如「墨竹」之含蓄簡約，再舉論路氏詩作裡別具物質美感情調的漢字修辭藝術，最後歸結到自己就「活在中國」而從「髒和亂與憂傷之中」<sup>51</sup>體會的美好。而正是這種既擬仿文人談文論藝的風雅，卻又逸離出文人寫作的清逸淡泊，張在〈詩與胡說〉裡雖沒有直接引入女性為申說對象，但其可謂以自嘲的「胡」亂「說」話，暗表自己對於詩此一菁英體裁所提出瑣言式的小道評析，可謂展現了其「婦人」之言較男性文人言志話語<sup>52</sup>而另成一格的女性意趣。

值得注意的是，張在〈詩與胡說〉引的「苦竹」譯詩，或是文章標題「胡說」一詞具有的暗喻訊息（包括「胡」亂「說」話、或為「胡」蘭成所「說」），並顯示了張愛玲該文與胡蘭成 1944 年 10 月創辦的文藝雜誌《苦竹》的關聯性。事實上，作為胡蘭成受日人扶植所創的小型同仁雜誌，《苦竹》是胡在離汪親日的過渡時期，欲以爭取淪陷區政一文壇話語權的刊物。<sup>53</sup>由此背景來論，張愛玲在〈詩與胡說〉援引的「苦竹」譯詩，不僅間接帶出《苦竹》一刊所折射胡與彼時淪陷區政治生態和文藝話語場的糾葛；<sup>54</sup>且對胡來說，張的〈詩與胡說〉與其在《苦竹》發表作品，亦使胡將張納入該刊在文藝生產話語的「同仁」範疇，<sup>55</sup>既由此增添刊物在文學聲勢上的象徵資本，且胡在《苦竹》的發表文章裡亦再次將張愛玲引為評說對象，由此來連繫至他對大東亞主義<sup>56</sup>的美化詮說。

<sup>51</sup> 張愛玲：〈詩與胡說〉，頁 165、168。

<sup>52</sup> 劉威志：《梁汪和平運動下的賦詩言志（1938-1948）》（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 105 年度博士論文，2016 年）。

<sup>53</sup> 楊世運：〈胡蘭成和張愛玲的“苦竹”〉，頁 34-36。

<sup>54</sup> 舉例來說，《苦竹》標題為取自周作人《苦竹雜記》，有著胡向周致敬的意味；然而，胡在該刊第二期〈編後〉，則以夏日「苦竹」在「驚異忐忑」中等待「脫出」為喻，暗表自己不循周氏的前輩作風與離汪投日的政治動向。止庵，〈苦竹詩話〉，《南方周末》（2008 年 4 月 3 日）。

<sup>55</sup> 張為《苦竹》提供了散文〈談音樂〉與小說〈桂花蒸 阿小悲秋〉，其〈自己的文章〉亦在該刊第 2 期重刊；張愛玲好友炎櫻的散文〈死歌〉、〈生命的顏色〉（張譯）亦刊《苦竹》第 1、2 期；至於張在〈詩與胡說〉評點的路易士，亦在《苦竹》創刊號發表〈詩四首〉。李娟：〈《苦竹》雜誌時期的張愛玲與胡蘭成〉，頁 53-54。

<sup>56</sup> 大東亞主義，指日本帝國於明治維新提出的亞細亞主義，後於二戰時被日本宣揚為政治意識形態，主張將亞洲各國與民族通過日本帝國帶領下，從歐美列強勢力中解放出來，進而共存與共建一以日本為首的亞洲新制度政治體。林慶元、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242-276、339-380。大東亞主義所涵攝東洋儒道、日本國學與神道觀而強調八紘一宇、「協和萬邦」與「共存共榮」等思想背景，參李文卿：〈帝國想像與大東亞文藝運動〉，《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

如胡蘭成此類作品，可見其於《苦竹》發表的〈中國文明與世界文藝復興〉一文。<sup>57</sup>當中，胡從剖析東、西方文明的史觀視角，並將張的文學實踐引為詮說對象，將其作品視為漢民族的文藝復興，進以寄託他對大東亞主義的詩意禮讚。事實上，該文前身可溯及胡餘月前發表的〈文明的傳統〉<sup>58</sup>：文中，胡一方面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流於形而下的物質耽溺與非人性的空乏冷酷，另一方面則著力讚揚東方文明富含「貞潔」與「親切」的「悠久的感情」，從中申說東方文明的人情傳統可孕育出未來世界文明的復興與新生。而在胡的闡述下，日本以飽含傳統「安穩」、「約制」的美，並在明治維新後「迸出」「生命力的放恣」，足以映顯日本經西方資本主義洗禮後所達至「更深更廣地成長著」，使胡蘭成將日本推為東方文明在近世以降的佼佼典範與表率。

延續著在〈文明的傳統〉裡宣揚東方文明為根植於形上精神性而富含的神性之美，胡在〈中國文明與世界文藝復興〉裡進一步從剖析世界文明歷史源流的角度，企以推導出其以呼應大東亞主義而著力強調東方文明將引領世界文藝復興的重要地位。如胡在文章開首便直指彼時世界戰事淪為文化浩劫，並批判重慶政府與共產勢力主張戰鬥之「狠」對文化的破壞。為此，胡回溯東、西方文明沿革的發展軌跡，既論指近代西方文明講究「事功」（即戰功）而終將身陷「物障」的迷昧；另一方面則盛讚中國六朝以「無事功」的偏安，得以成就「文采風流」並開創大唐文明新局的漢民族文藝復興高峰。而在胡看來，自六朝的文藝高峰過後，唯有民國以來的張愛玲及其筆下美文能盡得「六朝人的人生的華麗」，且張氏作品所蘊含「人的發見」，更是體現東方傳統經西方文明洗滌後「從人事解放出來」、「走大更廣大的人生」的飛躍。胡因此於文末發其宏觀大願，提出大戰後的世界不在孰敗孰勝，而是張愛玲的作品所代表統合東、西方文明而「給世界開一個時代」的文藝復興成就，足以展示「人類的光榮將歸於漢民族」，「而最能懂得這個的，將是大和民族。」

事實上，胡蘭成在以上引文中試圖以東方文明傳統來申說大東亞主義的文化關懷（及其寄託的政治企圖），既在概念闡述上顯得夾纏與模糊曖昧，亦顯示其立

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臺北縣板橋市：稻香，2010年），頁21-113。

<sup>57</sup> 胡蘭成：〈中國文明與世界文藝復興〉，載《苦竹》第3期（1945年3月），收於《亂世文談》，頁180-202。

<sup>58</sup> 胡蘭成（署名敦仁）：〈文明的傳統〉，載《苦竹》第2期（1944年11月），收於《亂世文談》，頁172-179。

論邏輯過於片面與失之單薄。此如論者指出的，胡在〈文明的傳統〉與〈中國文明與世界文藝復興〉裡歌頌日本文明在明治維新後兼容傳統東方感性與西方理性達到的文化高度，又或是其將日本視為振興華夏民族前途的東方文明典範，其論點不僅忽略了日本近世包括「脫歐入亞」與軍國主義等政治思想、社會型態與國家轉型的複雜背景，更可說極為弔詭地美化了「日本侵略者」藉「保存中國傳統」之名來行併吞中國之實的暴力本質。<sup>59</sup>但就胡蘭成來說，其將政治全面「抒情化」<sup>60</sup>的論述旨要，本就在彰顯其以文筆之美來將詭譎的現實政治取代以理想的歷史詩情，並由此合理化其政治立場。故在自言成理的申論邏輯下，張愛玲其人其作在胡蘭成充滿史詩情懷的修辭鋪述中，則被有意地納入六朝風流與東方感性傳統的文藝與文化審美範疇，成為了胡申說其附應大東亞主義的特定女性意符。

而除了胡蘭成，這種依託張愛玲的女性形象來美化大東亞主義的論述邏輯，亦可見胡蘭成彼時文壇盟友沈啟無(1902~1969)在《苦竹》發表的〈南來隨筆〉<sup>61</sup>。沈在文中不僅以標題的「南來」，暗表其南下目的將與胡展開的合作關係，亦以充滿審美觀照與詩意啟迪的文字而呼應胡蘭成在〈評張愛玲〉對張氏的唯美評說，進以將張氏的寫作特質，賦予上具有大東亞主義意味的美感情調與抒情想像，從中以表他對東亞文明傳統的歌詠與懷想渴慕。例如，沈在文章開首處便以看似雲淡風輕之筆，將其與周作人「交惡」<sup>62</sup>而不得不南下的仕途羈旅，轉化為曠達自懷的南來隨筆，隱微地襯托其與胡不畏權威而恬淡自守的文士形象。其後，沈則聚焦「苦竹」一詞所勾連的文學事典，既自陳「苦竹」譯詩為出自其手，有意將該譯詩行為具有的典範意義，為自身正名；並讚賞張愛玲與友人繪製的《苦竹》封面，闡揚其用色「典雅」而富有「日本樸實的空氣」與「東方純正的美」的美學深度。而於文章後半部，沈更大幅度地呼應胡在〈評張愛玲〉對張的唯美詮說，

<sup>59</sup> 王德威：〈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頁 181。

<sup>60</sup> 王德威：〈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頁 182。

<sup>61</sup> 沈啟無：〈南來隨筆〉，載《苦竹》第二期（1944 年 11 月），收於陳子善編，《張愛玲的風氣：1949 年前的張愛玲評說》，頁 91-95。

<sup>62</sup> 胡蘭成（署名江梅）：〈沈周交惡〉，載《苦竹》創刊號（1944 年 10 月），收於《亂世文談》，頁 43-47。沈啟無，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曾與周氏選輯明清小品為《近代散文鈔》。北平淪陷後，沈在偽華北作家協會等處任職，後與周作人衝突，1944 年 3 月遭周〈破門聲明〉斷絕師徒關係。後沈南下，參與胡《苦竹》，並於同年 11 月赴武漢，與胡協辦《大楚報》。高恆文：〈謝本師：“你也需要安靜”——沈啟無與周作人〉，《現代中文學刊》總第 18 期（2012 年第 3 期），頁 23-36。黃開發：〈沈啟無——人和事〉，《魯迅研究月刊》2006 年期 3，頁 57-65。

強調張氏談畫論樂之文具有「溫厚情感」和似「六朝人的華瞻」，亦以感性筆觸，謳歌張氏寫作所流露對普凡「眾生」具神性般的「有情」觀照與「廣大的愛悅」，盛讚一切「有情無情」在張愛玲筆下皆能「各正性命」。<sup>63</sup>

承上來論，沈與胡在其散文裡共同安插進對張作的評賞，固然顯示了對於張愛玲文學才華的肯定；<sup>64</sup>但更重要的是，兩人顯然有意地將張引為象徵符碼，藉以美化自身對於親日主和與附應大東亞主義的政治表態。細析以觀，如果說沈啟無側重於將張愛玲的文采情韻比附於大和文明之雍容典雅與大東亞主義的民族共榮情懷，胡蘭成則由沈的觀點，大幅度地延展出政治觀的抒情詮說。如胡在沈的觀點上強調了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堪比六朝文采，從中暗指了張成名的戰時滬上淪陷區即如同六朝偏安，即二者政權皆以無戰功建樹的陰柔形象，反而以退守一隅的「無事功」、「有人生的餘裕」而為文藝盛世。並且，胡蘭成亦放大了沈在〈南來隨筆〉裡強調張愛玲作品具有的東方審美意蘊，進以將張氏的文學成就標舉為東方文明復興的代表，彰顯其附應於大東亞主義而提出極為磅礴偉燦的文化—政治願景。然而，相較於胡蘭成將張愛玲其人其作引為一唯美意象，藉此粉飾其擺盪在「中華文化本質論」與大東亞論述之間的曖昧辯證，<sup>65</sup>並投射出他對戰後前景充滿「抒情好景」<sup>66</sup>的政治擬想；隨著 1944 年底胡赴武漢辦日人所轄的《大楚報》、1945 年中《苦竹》停刊與戰事鄰近終結，張愛玲散文寫作中的女性意象則漸趨低調，透露出張對淪陷區政局之前景未明的隱隱憂思。

如張愛玲 1945 年中發表的〈我看蘇青〉<sup>67</sup>，文中雖延續了她以婦人性為旨來著墨於日常凡俗的寫作觀，但其對蘇青女性形象的詮說，則少了〈談女人〉裡就女人創世論的神采飛揚，卻以夾雜個人身世與歷史感悟，流露出對亂世艱難的徬徨之感。此可見文章開首處，張稱揚了蘇青所具「廣大親切」的「女人」特質，讚許蘇為「喚醒了往古今來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然而，張愛玲對蘇青女性形象的歌頌，除了強調蘇青象徵體貼平實的物質生活，亦引發她對自身成長路

<sup>63</sup> 沈啟無：〈南來隨筆〉，頁 94。

<sup>64</sup> 蔡登山：〈張愛玲文壇交往錄（1943-1952，上海）〉，《新文學史料》2011 年第 1 期，頁 12-13。

<sup>65</sup> 王德威：〈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頁 180-184。

<sup>66</sup> 王德威：〈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頁 196。

<sup>67</sup> 張愛玲：〈我看蘇青〉，載《天地》第 19 期（1945 年 4 月），收於《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頁 260-277。

上遭遇生活磨難的「身世之感」。因此，沿此記人兼自喻的書寫視角，張愛玲雖以充滿歷史感懷的文字來形容蘇青如大唐盛世楊貴妃所具「為人的熱鬧、親切」，但其筆鋒之間對於身處亂世的不確定感，及其在文末記寫陽台觀望城疆之月而抒發「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的時代預測，皆顯見張對滬上偏安處境之不久長而隱懷的憂患意識。<sup>68</sup>

值得注意的是，張愛玲除了在〈我看蘇青〉裡藉書寫蘇青的「亂世佳人」形象，從中側寫淪陷區偏安日常將隨戰事終結而不再的悵觸；事實上，張在戰後初期亦透過作品封面的女性意象，暗示時代劇變下的中國文明世景與自我寫作處境的變化。此可見二戰結束後，張的散文產量銳減，直至 1946 年底，為因應《傳奇》增訂本出版，張特為此集為文〈有幾句話同讀者說〉與跋〈中國的日夜〉，並為該部集子設計了以女人為意象的封面（見圖三）<sup>69</sup>。據張自陳，該封面借用了一幅晚清仕女圖為主圖，而她則是於主圖右側加上一「比例不對」、像「鬼魂般」「孜孜往裏窺探」的現代「人形」，有意製造出古、今女人／鬼併置而「令人感到不安」的詭異效果。<sup>70</sup>對於張愛玲來說，這個具有奇幻氛圍的封面設計，既可連結至其創作觀的暗喻線索；<sup>71</sup>然而，如細究該封面裡的女性意象，可見遮臉女子的模糊身影，不僅透露出張於戰後那無可名狀而潛藏避世的困頓心境，<sup>72</sup>且遮臉女子對主圖「晚飯後家常一幕」的介入與破壞，亦可說映顯出張心目中那代表基本日常與普世安穩的「婦人性」，終將在時代進程下裂變、乖離與成為歷史巨輪下失不可得的過去，而她也將從繁華絢爛歸於沉寂，為自己的寫作前程留下耐人尋味的伏筆。

<sup>68</sup> 黃心村：〈她的名字寫在水上：張愛玲與現代散文〉，頁 160-165。

<sup>69</sup> 張愛玲：《傳奇增訂本》（上海：山河圖書公司，1946 年 11 月）。封面圖為筆者自攝。

<sup>70</sup> 張愛玲：〈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傳奇增訂本》，未標明頁數。

<sup>71</sup> 參陳建華：〈質疑理性、反諷自我：張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現代性〉，林幸謙編：《張愛玲——文學、電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30-266。

<sup>72</sup> 解志熙：〈走向妥協的人與文——張愛玲在抗戰末期的文學行為分析〉，《文學評論》2009 年第 2 期，頁 147-148。



圖三

《傳奇增訂本》封面

(上海：山河圖書公司，1946 年)

#### 四、結語

本文以張愛玲與胡蘭成戰時散文為對象，追蹤兩人以女人為喻的寫作表現，既有著為自身與對方樹立文學定位的用意，亦存在著雙方對戰時淪陷區時代處境的現實隱喻。本文首先溯及張愛玲憑藉「鴛鴦派」資源登上文壇的女作家形象，進以關注其〈談女人〉的女人文明觀，探論該文啟發胡蘭成發揮為女神論來評張，同時寄託其親日主和的政治比附。其後，耙梳張在談文論藝的散文中以婦人性為喻的日常寫作觀，探論張從中寄託對淪陷區偏安處境的生活雜感，接以探析胡在《苦竹》裡以引入張愛玲的女性意象，由此美化他應合大東亞主義的文化—政治詮說。最後，本文指出張愛玲〈我看蘇青〉一文與其為戰後《傳奇》增訂版設計的女性意象，隱喻著她對戰後前景的不確定、及其就自我創作定位的深沉思考。

概言之，有別於歷來就張愛玲散文的討論，多集中在其文字美學技藝和與女作家群體的關聯，本文則關注張和胡蘭成戰時寫作中的女性意象，探析兩人藉此寄寓對滬上淪陷區語境的現實觀照。此外，相較於迄今就張、胡的研究，多關注在兩人私領域的情戀關係，或是集中在胡蘭成受到張氏的文學影響，本文則指出雙方文字技藝的交會，皆有對滬上淪陷區之政治處境與時代生態的現實回應。然限於篇幅，本文僅以舉論方式探析張、胡戰時散文以女人為喻的寫作表現，如欲就兩人的文學交涉有更全面的掌握，將待日後專文處理。

## 徵引文獻

### 一、近人論著

止庵：〈苦竹詩話〉，《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

王道：〈《花經》、黃家花園與周瘦鵑父子〉，《書城》2020年第7期，頁93-97。

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池上貞子：〈傳記與虛構：張愛玲與陳舜臣及其他日本作家的對照〉，收於林幸謙主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新北市：聯經，2018年，頁247-266。

池上貞子：〈張愛玲與日本——談談她的散文中的幾個事實〉，收於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麥田，1999年，頁83-102。

吳邦謀：《尋覓張愛玲》，香港：商務印書館，2020年。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臺北縣板橋市：稻香出版社，2010年。

李相銀：〈論《雜誌》對張愛玲“經典化”的意義〉，《廣西社會科學》總第161期，2008年第11期，頁136-140。

李相銀：《上海淪陷時期文學期刊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

周芬伶：《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臺北：元尊文化，1999年。

林夏：〈張愛玲和《苦竹》〉，《河南教育（中旬刊）》總第90期，2012年第10期，頁60-61。

林慶元、楊齊福：《“大東亞共榮圈”源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姚玳玫：〈與迅雨對話：張愛玲的女性修辭〉，《新文學史料》2004年第3期，頁153-157。

胡蘭成：《亂世文談》，臺北：印刻文學，2009年。

郁穎：〈新世紀張愛玲散文研究綜述〉，《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總第174期，2013年第2期，頁32-35。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秦賢次：〈謊言與真相——胡蘭成生平考釋〉，《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1期，頁28-41。

高宣揚：《布爾迪厄》，臺北：生智，2002年。

高恆文：〈謝本師：“你也需要安靜”——沈啟無與周作人〉，《現代中文學刊》總第 18 期，2012 年第 3 期，頁 23-36。

高嘉謙：〈風雅·詩教·政治抒情：論汪政權、龍榆生與《同聲月刊》〉，《中山人文學報》第 38 期，2015 年 1 月，頁 61-88。

張英進：《理論、歷史、都市：中西比較文學的跨學科視野》，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

張桂華：《胡蘭成傳》，臺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11 年。

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臺北：皇冠，2001 年。

張愛玲：《傳奇增訂本》，上海：山河圖書公司，1946 年 11 月。

張瑞芬：《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臺灣當代文學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07 年。

張瑞芬：〈張愛玲的散文系譜〉，《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8 期，2004 年 5 月，頁 79-105。

陳子善編：《張愛玲的風氣：1949 年前的張愛玲評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陳建華：〈周瘦鵑與紫羅蘭：文化商品的建構及其文化意涵〉，《中正漢學研究》總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頁 239-270。

陳建華：〈演講實錄 I——民國初期消閒雜誌與女性話語的轉型〉，《中正漢學研究》總第 22 期，2013 年 12 月，頁 355-386。

陳建華：〈質疑理性、反諷自我：張愛玲《傳奇》與奇幻小說現代性〉，收於林幸謙編，《張愛玲——文學、電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30-266。

陳麗芬：《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臺北：書林，2000 年。

傅葆石著、張霖譯：《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年。

黃心村：〈光影斑駁：張愛玲的日本和東亞〉，收於林幸謙主編：《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新北市：聯經，2018 年，頁 189-208。

黃心村著、胡靜譯：《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10 年。

- 黃開發：〈沈啟無——人和事〉，《魯迅研究月刊》2006 年期 3，頁 57-65。
- 黃開發主編：《中國散文通史·現代卷（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年。
- 黃錦樹：《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臺北：麥田，2006 年。
- 楊世運：〈胡蘭成和張愛玲的“苦竹”〉，《粵海風》，2011 年第 2 期，頁 34-36。
- 楊佳嫻：《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
- 楊照：《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臺北：麥田，2010 年。
- 葉凱蒂：〈在淪陷上海寫作——蘇青以及她所創辦的文學雜誌《天地》〉，收於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下）》，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年，頁 649-676。
- 解志熙：〈走向妥協的人與文——張愛玲在抗戰末期的文學行為分析〉，《文學評論》2009 年第 2 期，頁 137-149。
- 裴海燕（Jana Benešová）：〈“平實而熱鬧”之外——蘇青的寫實主義〉，《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135-165。
- 劉威志：《梁汪和平運動下的賦詩言志（1938-1948）》，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文所 105 年度博士論文，2016 年。
- 劉紹銘：《愛玲說》，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 年。
- 劉鋒杰：〈青春的張愛玲——由胡蘭成的《評張愛玲》談起之一〉，《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總第 72 期，2004 年第 4 期，頁 12-18。
- 蔡登山：《傳奇未完：張愛玲》，臺北：天下遠見，2003 年。
- 蔡登山：〈張愛玲文壇交往錄（1943-1952，上海）〉，《新文學史料》2011 年第 1 期，頁 4-18。
- 鍾正道：〈試析張愛玲散文中的女性意義〉，《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 5 期，1998 年 5 月，頁 97-111。
- Boyle, John Hunter. (1972).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9: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ckwell, Peter. (2012). *Texture: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